

邱式邦院士传略



邱式邦（1911.10.1—2010.12.29），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人。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农业昆虫学家、植物保护学家，中国害虫综合防治、生物防治的开拓者。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北京昆虫学会理事，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联合国粮农组织虫害综合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曾长期担任《植物保护学报》、《昆虫学报》、《植物保护》等学术期刊编委。《生物防治通报》创刊人。1964年曾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邱式邦院士从事害虫防治研究工作70余年，理论联系实际，以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服务农业生产，发表学术论文105篇。研究明确了飞蝗、土蝗、松毛虫、玉米螟，以及大豆害虫、甘蔗害虫等多种重大农林害虫的发生为害规律、预测预报方法、简便易行的综合防治技术，提出根治蝗虫产卵、孵化滋生地的生态调控技术。研制成功灭蝗饵剂、防治玉米螟颗粒剂等，在全国大面积应用推广，为保障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增效节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技术贡献。20世纪70年代，他结合多年科学技术研究与农业生产理论实践的体会，高屋建瓴总结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科学技术思想，1975年被确立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1978年负责筹建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1990年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致力于开展害虫天敌保护和国外优良天敌资源引入利用，积极倡导推动全国生物防治技术研究工作。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创办《生物防治通报》（1995年更名《中国生物防治》，2011年更名为《中国生物防治学报》），担任期刊主编23年。邱式邦院士毕生献身中国植物保护科学事业，并积极培养提携后学。他曾先后荣获农业部爱国丰产奖、全国劳动模范金质奖章、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国务院表彰嘉奖、法国农业部功勋骑士勋章、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首位“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投身农业科学，努力钻研求索

邱式邦，1911年10月1日（辛亥年农历八月十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1925年考取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国的刘廷蔚先生开启了他对生物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老师的循循善诱和悉心教育指导，对邱式邦毕生投身昆虫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6年春，邱式邦走进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大门，担任病虫害系技佐，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实验所被迫向西南地区搬迁，他



沪江大学旧址



沪江大学毕业照
(1935年)



广西沙塘病虫害组同事合影(1939年)
(第二排右二为邱式邦)



被分配到该所广西柳州沙塘工作站，直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才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回到了南京。在这段颠沛流离、研究工作条件十分艰难的岁月里，他努力钻研求索，先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绵蚜、飞蝗、土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昆虫资源种类调查等方面的研究，掌握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实验数据资料，以第一作者发表了 16 篇卓有见识的学术论文，做出了扎扎实实的成绩。早年这段独当一面承担科学研究的工作经历，锤炼提高了他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素养，也为日后深入研究并最终战胜蝗虫灾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同事合影(1946 年)
(后排左三为邱式邦)



广西沙塘病虫害组的温室前 (19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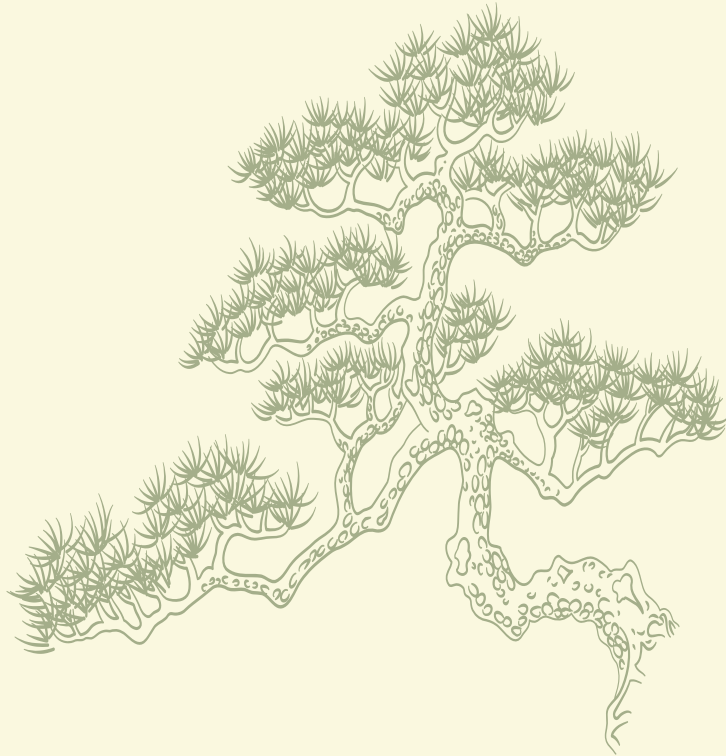


在广西沙塘甘蔗地里 (1940 年)

悠悠赤子，开创新中国治蝗事业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耕大国，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就遭受蝗虫的严重为害。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蝗螟，农夫得而杀之。”有史料记载的重大蝗灾便有 800 多起。唐代曾有文字记载：“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元史》记载的山东、河南一次蝗灾：“飞蝗蔽天，人马不能行……”从古至今，蝗灾与水灾、旱灾同为华夏大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三大“天灾”，蝗虫可谓是天地之间的第一大害虫。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旧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外患”与“人祸”横行的苦难时期，连年的蝗灾更让社会底层劳苦大众苦不堪言。

抗战初期，黄河花园口被炸开决堤后，黄河肆虐，淹灭了豫、皖、苏三省 1 400 多万亩农田，黄泛区内田地荒芜，民不聊生，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蝗灾。到 1944 年，在被淹泡了 7 年之久的中原地带，仅河南省飞蝗发生面积就达到 5 800 多万亩，治蝗成为国家解决民生的大难题。邱式邦正是在此危难之际开始走上治蝗事业的荆棘之路。当时，他面对的是饥民遍野、满目疮痍，老百姓仍然采用老一套的人工扑打治蝗。这种落后的治蝗手段对于铺天盖地的蝗虫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1947 年英国卜内门公司治蝗新药——六六六问世，他立即将其引入中国，开展田间研究试验。新农药六六六是浓缩剂型，他因地制宜，拌上填充物改进成便于施用的粉剂，在蝗区研究试验，蝗虫死亡率达到 90% 以上。1948 年，他将最新的研究结果撰写出国内第一篇使用六六六粉剂治蝗的技术报告，发表在《中华农学会报》上，期望着这项新的灭虫技术，能够尽快造福于民众。然而，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他为国为民治理蝗虫的满腔热情和努力成功的喜悦，最终化作了破碎的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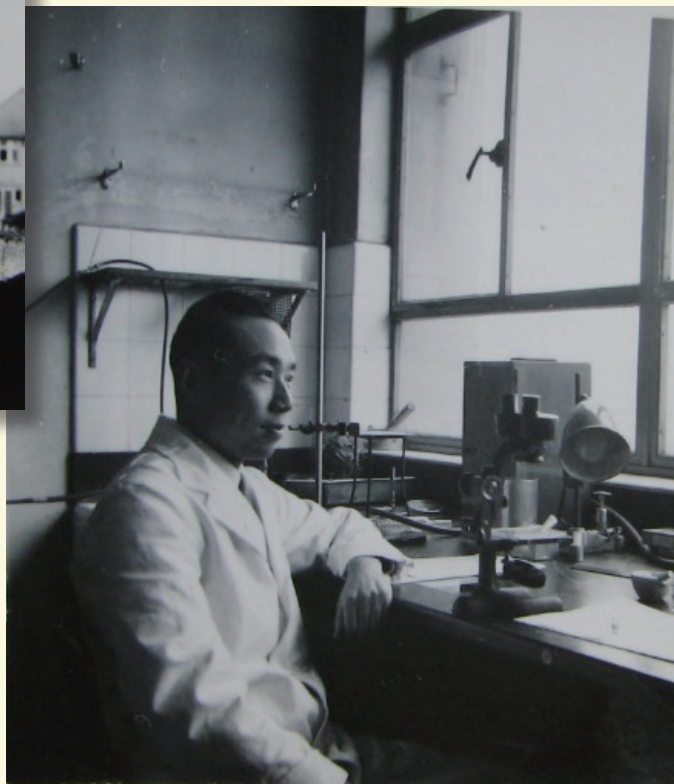




1948年，邱式邦取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1949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系学习。在V.B.Wigglesworth教授指导下研究蝗虫生理，并与英国治蝗研究中心的B.P.Uvarov博士密切联系，学习国际治蝗经验。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这一永生难忘的日子恰巧是他38周岁的生日，让身在异国读书求学的邱式邦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一天，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阅报室，看到《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国内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在黄骠开展治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那短短的一条信息，对身怀报国之心之邱式邦触动很大，五星红旗在召唤！他毅然决定放弃剑桥的学习生活，矢志把知识转化为技术报效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开始追求新的科学事业。



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1949年)



在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室
(1950年)

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 110 周年

1951 年 9 月底，邱式邦历经辗转颠簸，从英国剑桥途径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闻知，特别邀请他出席了当地 10 月 1 日举办的国庆观礼活动。当他站在主席台上，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第一次聆听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时虽说国内可以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但是试验面积不大，国产的六六六也尚在试产阶段，尚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大量需求。面对着国家药剂有限，喷药器械不足的诸多困难，邱式邦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他发明的毒饵治蝗技术。这种方法比直接喷粉省药、经济、简单易行，等量的六六六药剂防治蝗虫的面积可扩大 10 倍。新的毒饵治蝗技术被迅速应用推广，1952 年应用 80 万亩、1953 年 100 万亩，消灭蝗虫旗开得胜。然而在他进一步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发现，要根治蝗害，还必须做到对全国各地蝗区的情况了如指掌，飞蝗的发源地在何处？什么时候发生？蝗虫的数量密度多大？诸多的规律还不完全清楚。控制蝗虫成灾，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邱式邦与他的助手蒋元晖正在观察蝗虫饲养情况（1956 年）



组建治蝗队赴青海草原，深入第一线开展治蝗工作（1958 年）
后排右一为邱式邦、前排右二为助手蒋元晖



治蝗队在向藏民宣讲治蝗知识（1958 年）

20世纪50年代深入蝗虫灾区开展治蝗技术研究试验，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乘坐牛车马车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徒步调查和风餐露宿习以为常。即便在县城入住的所谓招待所，也往往是四处透风的破庙，睡觉时更是常与佛像神龛为邻、与臭虫虱子结伴。蝗虫灾害地区大都地处盐碱地荒滩，常年缺少生活淡水，长期蹲点开展工作，一小盆水时常要从早上洗脸、中午擦身擦汗，一直用到晚上洗澡洗脚，日常克服用水之需比解决食宿更为艰难。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准确详实的第一手实验数据，彻底摸清掌握蝗虫的行踪规律，邱式邦全然不顾这些困难和挑战，始终坚持把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常年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治蝗生产第一线。

为了能够根治蝗虫，邱式邦进一步提出在蝗区建立侦察蝗虫的基层组织，蝗虫侦察制度包括：查卵、查蛹、查成虫三个关键环节，即“三查制度”。当时蝗区大都是条件最为落后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而这些具体的技术工作在蝗区很难落实。培养干部、大学生下去侦察，远水难救近火。蝗区那么大，每年发生数千万亩，工作任务巨大，老百姓又多是文盲，不懂虫情侦察，怎么办？必须培训农民、普及技术，这是治理蝗害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蝗虫在孵化过程中，当幼虫处于3龄前期的阶段最好聚歼消灭。这时幼虫发生面积小，密度集中，活动能力弱，耐药力差，此时扑打、药杀最为经济有效。他带领助手李广博等在山东惠民、垦利、沾化、利津等县忙碌了近半年，详细绘制出蝗区常见的各类蝗虫，教会没文化的农民识图、画圈，比如每平方米有5个蝗虫就圈1个圈，有10个就圈2个圈。这种调查办法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简单易学，普通农民也便于掌握。

同时，为了更充分调动老百姓侦察蝗虫的积极性，他又建议地方主管领导给承担虫情侦察的人员搞“代耕”，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政府的大力支持组织下，各地逐渐建立起长期侦察测报队伍，逐级建立了固定人员的组织，构成完整的虫情预报网。建立“三查”技术体系后，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不仅防治效率大大提高，而且1953年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力，就比1951年减少了80%，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广蝗虫“三查”工作，开创了我国害虫预测预报之先河，为新中国建立开展害虫预测预报研究应用，指导服务于农业生产，迈出了坚实重要的第一步。

建立完善飞蝗侦察制度和药剂治蝗成功后，彻底改变了全国治蝗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国开始走上了有计划的现代化科学治蝗之路。结合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实施消灭飞蝗滋生地等措施，飞蝗发生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四五千万亩压缩控制到五六百万亩，每年至少可以挽回数亿千克粮食产量的损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扼制蝗虫猖獗为害、保障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为国家的粮食安全生产和新政权的稳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在总结建国十周年的报告中着重指出，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两大成就：治蝗与消灭钉螺。半个世纪前的治蝗科学理论、技术方法与生产实践意义，至今仍然指导着我们的工作，他被当之无愧地誉为“新中国治蝗英雄”。

控制玉米螟害，为人民再立新功

玉米螟是我国影响玉米生产的首要害虫，每年发生 1~6 代，从北方的黑龙江到南方的海南岛，为害分布区域极为广泛。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邱式邦就在广西地区开始了玉米螟的生物学特性、寄生性天敌种类和农业防治方法的研究工作。他深入实际，连续 3 年开展玉米播种期与螟害关系的试验，系统观察了 41 个玉米品种，发现玉米品种间的抗玉米螟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证明了螟害发生轻重程度与玉米生长状况（株高、茎粗）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进而提出了采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玉米抗虫性标准的科学依据。这一技术标准后来一直被我国抗虫性鉴定工作者所采用。他是我国最早重视利用抗玉米螟作物品种特性，以减轻螟害损失的科学家，并且预见性地提出害虫防治方法，应该树立起“防重于治”的科学观点。这些早年的农业害虫研究与防治实践过程，为他后期学术思想的形成、凝练、升华，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田间玉米螟调查

20 世纪 50—60 年代，新中国领导人最感压力的头等民生大事，就是如何妥善解决 6 亿人口大国的粮食短缺问题。随着国家建设规模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确保粮食安全和数量供应，成为共和国百姓民众温饱安定生活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严峻的粮食危机，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全国玉米种植面积不断地增加，玉米螟的发生数量也随之扩大，危害损失程度日趋严重。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全国玉米螟害暴发成灾，演化上升成为降服蝗虫灾害后，发展农业生产上的第一大害虫。治虫安邦为己任，灭害保产担天责！邱式邦再一次迎难而上，担当玉米螟防治研究工作的重任。

当时在生产上，已经开始普遍推广使用六六六杀虫剂，一般采取玉米苗期液剂灌心的方法防治玉米螟。但这种方法存在着诸多缺点：工作效率低，费时费工，残效较短，尤其在缺水干旱地区推广使用受到条件制约，多年应用治虫的效果始终不够稳定。邱式邦针对这一问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首先从玉米螟的为害习性深入研究开始，详细探明了在玉米打苞抽雄前，绝大部分玉米螟幼虫生活在玉米心叶的缝隙内，这是防治螟害最有利的时机和位置。他又细心观察发现，采用传统方式六六六液剂灌注玉米心叶，其附着药剂的部位，随着玉米叶片的向上、向外生长伸出，逐日离开了幼虫生活为害的位置，施药数天后侵入的幼虫，已经完全生活在没有药剂分布的部位，药剂无法充分发挥其持效灭虫作用。他认识到，理想的玉米心叶期杀虫剂，不仅要在施药时可与虫体充分接触，在施药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也应能够继续分布在玉米幼虫经常活动的部位，而不受到玉米叶片生长的影响，才能够保证后续侵入的幼虫都能接触到药剂而发挥效能。



找到了防虫效果不稳定的关键矛盾，邱式邦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比较了液剂和颗粒剂施用后在玉米心叶中位置的变化，证明颗粒剂的杀虫效果明显优于液剂。因为颗粒剂施在玉米心叶中之后，它在重力的作用下能逆玉米叶片向上生长的方向移动，较长时间保持在与玉米螟幼虫接触活动的位置，即使玉米抽雄后一部分玉米螟在叶鞘内或经叶鞘入茎秆时，药剂仍能持续发挥杀虫作用。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和助手周大荣等又开始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利用农村中不用花一分钱，最易取得的煤渣、黏土、炕土、窑土等作为材料，晒干后打碎加工成 20~60 目的颗粒，经过反复试验改进，研制成功 5% 滴滴涕和 1% 林丹（六六六）颗粒剂。新剂型具有效力高、残效长、用工少、不用水、施药简便等特点。经过大面积推广示范，新的防治方法不仅能够防治一代玉米螟，还可兼治二代玉米螟，防治效果十分显著。1963 年，新型颗粒剂在河北、江苏、山西等省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比例迅速占到防治面积的 50% 以上，一般可以挽回玉米产量损失的 10%~30%。这项简便、实用、经济、可靠的新技术在全国玉米产区推广应用后，为有效地控制为害玉米的头号害虫、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生产，再立新功。



结合国情，提出植保方针

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邱式邦院士在与害虫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控制农业生物灾害的矛盾关系，不断总结植物保护科学理论和实践创新经验。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内外防治害虫主要依赖化学农药，长期过量使用出现和暴露了一系列的矛盾。邱式邦敏锐地认识到，推动中国植物保护技术发展，必须站在时代进步的高度，树立新的科学观念，必须深入研究探讨我们未来的植物保护技术策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975 年，他结合国情，站在未来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新高度，以唯物辩证的科学发展观，高屋建瓴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科学理念，1976 年被农业部确立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农业部组织的纪念“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贯彻二十周年研讨会上（1996 年，昆明）

组建团队，续航生物防治事业

20世纪70年代，邱式邦院士根据几十年来从事害虫防治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把握国内外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发展趋势，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物防治的研究方向。1979年7月15日，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筹建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1990年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承担起农业部第一个天敌引种检疫隔离实验室，负责全国的归口技术管理，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开展了天敌引种交换业务。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天敌保护利用、益虫繁殖释放、国外天敌引种、国际交流合作等，积极推动了我国生物防治科学事业的发展。



和草蛉组的同志在研究草蛉的
饲养技术（1979年）



为开展利用蓖麻蚕繁殖赤眼蜂考察
蓖麻的种植（1978年）



（1986年8月在中国农科院生防室楼前）



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 110 周年



与生物防治研究室部分
职工合影（1982年）



学生祝贺邱式邦院士
八十寿辰合影（1990年）



与他的研究生们的合影（1993年4月）
（左起：刘建军、王韧、陆庆光、邱式邦、杨怀文、万方浩）

内外交流，促进研究合作

十年“文革”动荡造成科技人才断层，对内对外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几乎中断。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也沐浴着科学的春雨发出了新的枝叶。年过花甲的邱式邦院士承担起中国植物保护对外科技交流的使命。他带队先后出访了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认真了解学习国外先进的植物保护技术与管理方法。在国内，接待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科学家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等，为我国生物防治对外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搭起了一座桥梁。



中国生防代表团访问美国（1978年）



介绍中华草蛉的人工饲养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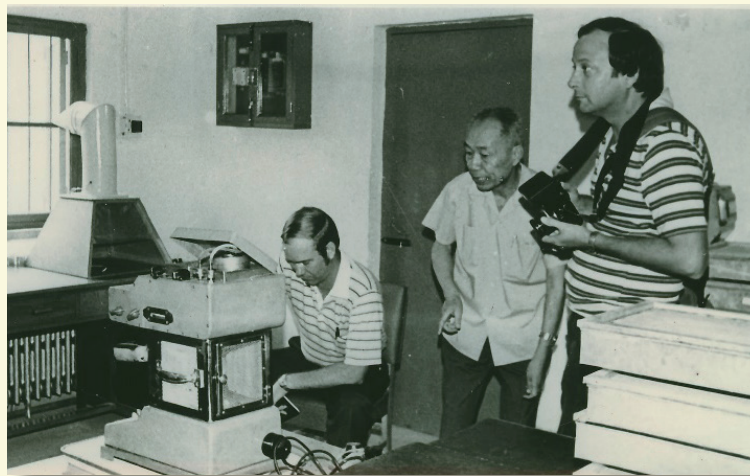


接待美国植保代表团（1980年7月）

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 110 周年



接待美国螟虫防治代表团
(1980年)



向美国科学家介绍人造卵机
(1980年)



在英国参加第十届国际植保会议
(1983年12月)
(与英国农业部长交谈)



在泰国参观田间试验（1986年）



全国第一次天敌保护利用学术
研讨会代表合影（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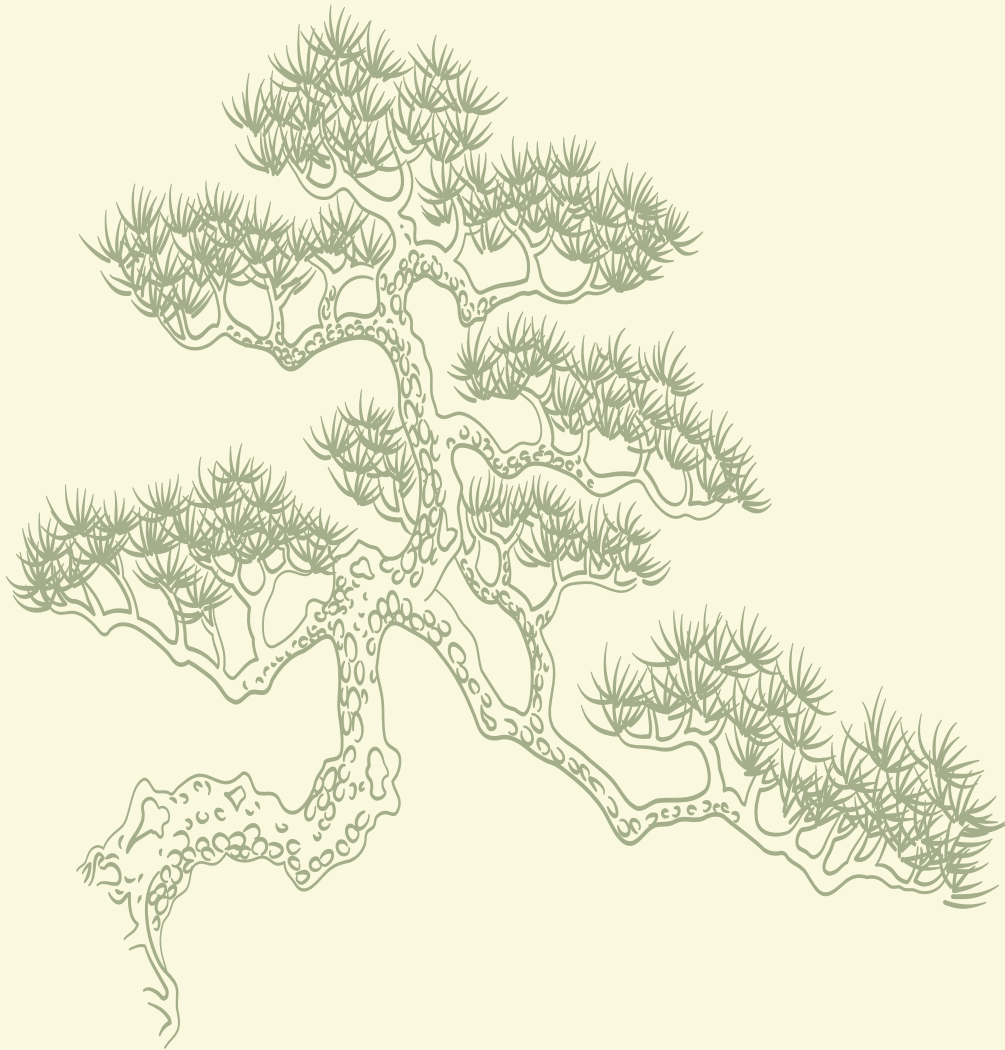
参加豚草综合防治论证会
（1989年8月）



考察我国第一个生防站——广东
顺德乐从生防站（1990年）



海峡两岸害虫生物防治研讨会参会代表合影（1998 年）



创办期刊，推动生防科学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生物防治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1985年,邱式邦创办了《生物防治通报》(现名为《中国生物防治学报》)学术期刊。在担任主编的23年里,他严格把握学术杂志的科学方向、服务对象和论文质量,以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标准,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对稿件的修改审定精益求精,直至90多岁高龄辞去总编职务后,仍坚持不懈地为期刊工作服务。多年来,在邱式邦院士精心培育和影响下,该期刊的稿件质量不断提升,其影响因子名列同类期刊前茅,为国内外了解和开展生物防治研究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生物防治通报》创刊一周年庆祝会
(1986年2月)



《生物防治通报》荣获优秀期刊奖
(1987年)



《生物防治通报》编委会委员在生防楼前合影(1991年)

德高望重，大家风范受人敬仰

邱式邦院士学识渊博，工作成就显著，对待科学问题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他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敬仰。他待人谦和忍让，尊重平等，对待工作和生活倡导节俭，他的学品和人品为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楷模。



中国农科院领导翟虎渠院长
看望邱式邦院士（2007）



刘旭副院长与邱式邦院士
讨论学科发展方向



与曾一起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合影



荣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庆典观礼代表（1999年）
（左起：郭予元院士、范云六院士、邱式邦院士、卢良恕院士）



中国农科院领导为邱式邦院士祝寿
(2006年)

(后排左起：人事局郝志强副局长、科技
管理局叶志华局长、刘旭副院长)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为邱式邦院士九十五周岁
华诞举行寿庆(2006年)

(左起：陈万权副所长、高士军书记、邱式邦夫妇、
刘旭副院长、吴孔明所长)



年轻学子与邱式邦夫妇合影

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 110 周年



左起：郭予元院士、邱式邦夫妇、吴孔明所长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祝贺邱式邦院士
99 岁寿辰（2009 年）



原生防退休老同志及部分学生
与邱式邦院士合影（2007 年）



举案齐眉，岁月静好



1946年，邱式邦院士与段醒男女士在重庆结为伉俪。夫妻相携相伴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旅程，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



结婚纪念照（1946年）



金婚纪念照（1996年）



邱式邦院士和家人（1979年）

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 110 周年



89 岁高龄攀上厦门鼓浪屿岩 (1999 年)



钻石婚纪念照 (2006 年)



邱式邦院士与夫人段醒男女士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五十周年暨邱式邦院士从业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合影

邱式邦生平重要年表

生卒

1911年10月1日（辛亥年农历八月十日）：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

2010年12月29日（庚寅年农历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逝世

学习与工作经历

- ◆ 1935年：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生物系毕业
- ◆ 1936—1948年：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先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绵蚜、飞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很大进展
- ◆ 1949—1951年：经考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留学奖学金，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系学习
- ◆ 1951年10月至1957年：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蝗虫防治的研究。
- ◆ 1957—1970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河南新乡继续研究蝗虫的防治，在河北衡水研究玉米螟的防治
- ◆ 1971—1974年：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部工作，下放到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红旗点蹲点
- ◆ 1974—1977年：在新成立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河南民权县蹲点，进行棉花棉铃虫生物防治研究，使草蛉天敌应用于生产，并提出“综合防治”的重要意义
- ◆ 1978—2002年：筹备并组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任研究室主任（1990年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并创办了《生物防治通报》，任主编（2011年更名为《中国生物防治学报》）。对捕食螨、丽蚜小蜂、赤眼蜂、草蛉、昆虫病原线虫的繁殖和保护利用，以及农用抗生素、病原真菌等开展研究和进行国际交流。受农业部委托，统一归口管理国外天敌资源引种工作
- ◆ 2003年至2006年3月：在生物防治研究所与农业气象研究所合并建成的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任研究员
- ◆ 2006年4月：随生物防治学科一并转入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任研究员

学术团体职务

- ◆ 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中国昆虫学会和北京昆虫学会理事，《生物防治通报》（2011 年更名为《中国生物防治学报》）主编，《植物保护学报》、《昆虫学报》、《昆虫天敌》等刊物的编委。

荣 誉

- ◆ 1964 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 ◆ 1978 年：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害虫综合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
- ◆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 1983 年：任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 ◆ 1985 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表 彰

- ◆ 1953 年：获农业部颁发的爱国丰产奖及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称号
- ◆ 1957 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及劳动光荣奖章
- ◆ 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
- ◆ 197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 ◆ 1985 年：获法国农业部授予的农业功勋骑士勋章
- ◆ 1985 年：因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并做出重要贡献，受到中国科学院表彰
- ◆ 1988 年：由于长期在开发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受到国务院表彰
- ◆ 2009 年：获农业部颁发的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表彰
- ◆ 2010 年：被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授予首位“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

邱式邦论著总目录

- 邱式邦. 玉米播种时期与玉米螟灾害轻重之关系. 广西农业, 1940 (6): 373-383
- 邱式邦. 广西玉米螟之越冬及其冬季防治方法之研究. 农报, 1940 (28-30): 572-579
- 刘廷蔚、邱式邦. 广西松毛虫之越冬及其冬季防治问题. 广西农业, 1941 (1): 2-13
- 邱式邦. 玉米螟害与寄主生长状况之关系及其在玉米育种上之重要性. 广西农业, 1941 (2): 126-133
- 邱式邦. 广西之玉米螟. 广西农业, 1941 (3): 205-223
- 邱式邦, 徐玉芬. 蓖麻诱杀金龟子之研究. 广西农业, 1941 (6): 454-467
- 邱式邦. 三年来利用播种时期以防治玉米螟之研究. 农报, 1941, 6 (1-3): 18-21
- 邱式邦. 广西大豆害虫之研究 (一) 豆荚螟. 广西农业, 1942, 3 (6): 351-370
- 邱式邦, 厉守性. 豆薯油乳剂与烟草水防治甘蔗绵蚜试验. 广西农业, 1942 (3): 179-189
- 邱式邦. 虫害—沙塘大豆歉收之主因. 广西农业, 1943 (3): 1-7
- 邱式邦. 植物油皂防治甘蔗绵蚜之研究. 广西农业, 1945 ((1-6)): 22-31
- 邱式邦. 茶油皂田间防治甘蔗绵蚜之效率及与人工刷杀法之比较. 农报, 1946 (2): 14-16
- 邱式邦, 厉守性. 十三斑大瓢虫防治甘蔗绵蚜之研究. 广西农业, 1947 (1-6): 26-32
- 邱式邦. 广西大豆害虫之研究 (二) 豆平腹椿象. 农报, 1947 (4): 10-13
- 邱式邦, 郭守桂. 三种新兴药剂粉用治蝗之研究. 中华农学会报, 1948 (187): 29-35
- 邱式邦. 广西大豆害虫之研究 (三) 豆潜蝇. 农报, 1948 (1): 4-6
- 邱式邦. 广西大豆之小绿象鼻虫. 中华昆虫学会通讯, 1948 (3): 35
- 邱式邦. 四川璧山区竹蝗调查报告 (英文). 1949 (未发表)
- 邱式邦. 非洲飞蝗的脂肪与蛋白质的变化 (英文). 昆虫学汇刊, 1952 (1): 101-109
- 邱式邦, 郭守桂, 李光博. 为什么提倡毒饵治蝗. 农科通讯, 1952 (8): 18
- 邱式邦, 郭守桂, 李光博等. 毒饵治蝗的方法. 农科通讯, 1952 (8): 20
- 邱式邦, 郭守桂, 李光博. 对于侦查蝗虫方法的建议. 农科通讯, 1952 (9): 29-31
- 邱式邦, 李光博. 安次县毒饵治蝗的经验介绍. 中国农报, 1952 (16): 17-18
- 邱式邦. 蝗虫的侦查问题. 农科通讯, 1953 (2): 53-54
- 邱式邦, 李光博, 郭守桂. 1952年推广毒饵治蝗的结果. 农科通讯, 1953 (2): 54-55
- 邱式邦, 李光博. 值得注意的全国土蝗问题. 农科通讯, 1953 (4): 175-176
- 邱式邦. 侦查蝗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农科通讯, 1953 (10): 421
- 邱式邦, 李光博. 几种主要蝗卵的识别. 农科通讯, 1953 (10): 425

- 邱式邦, 郭守桂, 束炎南. 树干涂刷 DDT 防治松毛虫研究. 昆虫学报, 1953 (1) : 15-24
- 邱式邦, 郭守桂, 束炎南. 用树干涂药法防治松毛虫 (松毛虫防治新法). 中国林业, 1953 (11) : 15
- 邱式邦. 为害绿肥豆荚的紫蓝小灰蝶. 昆虫学报, 1953 (2) : 181-184
- 邱式邦, 李光博. 1953 年毒饵治蝗情况. 农科通讯, 1954 (2) : 87-89
- 邱式邦, 李光博. 几种主要蝗虫的识别. 农科通讯, 1954 (2) : 204-210
- 邱式邦, 闫承守, 林汉连. 内蒙古毒饵治蝗工作中的几点改进. 农科通讯, 1954 (8) : 421-413
- 邱式邦. 南京地区松毛虫寄生天敌的初步观察. 昆虫学报, 1955 (2) : 181-190
- 邱式邦, 李光博, 林汉连. 几种饵料对蝗虫嗜食性的比较. 昆虫知识创刊号, 1955 (1) : 20-23
- 邱式邦, 李光博. 土蝗应该在什么时期防治. 农科通讯, 1955 (5) : 282-283
- 邱式邦. 飞蝗. 农科通讯, 1956 (3) : 14-150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 介绍一种轻便捕蝗器. 农科通讯, 1956 (5) : 306-308
- 邱式邦, 马世骏. 消灭飞蝗为害. 北京: 财经出版社, 1956
- 邱式邦, 李光博. 飞蝗及其预测预报.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56
- 邱式邦. 对草地螟预测预报工作的建议. 农科通讯, 1957 (6) : 312-314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 防治莜麦蝗虫. 农科通讯, 1957 (6) : 315-316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 草地螟拉网的初步改进. 农科通讯, 1957 (4) : 222-223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等. 青海省蝗区点查报告. 1958 (未发表)
- 邱式邦, 董慧芳, 李作龙. 毒土防治第一代玉米螟试验结果. 农科通讯, 1959 (15) : 520-521
- 马世骏, 钦俊德, 邱式邦. 蝗虫研究与防治. 昆虫学集刊, 1959: 18-37
- 邱式邦, 李作龙, 董慧芳. 毒土防治玉米螟的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 1960 (4) : 43-46
- 邱式邦, 魏鸿钧. 玉米心叶期施用颗粒剂对控制穗期螟害的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 1961 (4) : 49-50
- 邱式邦. 玉米心叶期使用药剂防治玉米螟. 中国植物保护科学, 科学出版社, 1961: 437-445
- 邱式邦. 华北地区的土蝗及其防治. 中国植物保护科学, 科学出版社, 1961: 467-481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 蝗虫的分布、消长和活动与植被关系的研究. 植物保护学报, 1962 (2) : 17-22
- 邱式邦, 林汉连, 蒋元晖. 内蒙古黄旗海地区蝗虫的研究. 植物保护学报, 1962 (3) : 285-290
- 邱式邦, 魏鸿钧, 董慧芳. 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的研究. 植物保护学报, 1963 (2) : 123-133
- 邱式邦, 董慧芳. 怎样配制防治玉米螟的颗粒剂. 人民日报, 1964, 6 月 6 日
- 邱式邦. 提高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的效果. 人民日报, 1964, 6 月 8 日
- 邱式邦, 周大荣, 董慧芳. 双层颗粒筛、颗粒撒播器. 人民日报, 1964, 6 月 8 日
- 邱式邦, 周大荣, 董慧芳. 玉米不同生育期遭受螟害对产量损失的影响. 植物保护学报, 1964 (3) : 307-311

- 邱式邦. 颗粒剂防治玉米螟问题. 山西植保学会颗粒剂防治玉米螟会上报告, 1964
- 邱式邦. 有关玉米螟防治的几个问题. 河北农业技术, 1965 (5): 14
- 邱式邦, 周大荣, 董慧芳. 用“数叶片法”掌握和预测玉米螟防治适期. 植物保护, 1965 (4): 153-154
- 邱式邦. 西铺大队小麦黄叶病发生和防治情况调查. 1971 (未发表)
- 邱式邦. 核桃黑防治研究工作总结. 1971 (未发表)
- 邱式邦. 对 1972 年核桃黑防治工作的建议. 1972 (未发表)
- 邱式邦. 国外植物保护工作概况. 中国农业科学院: 国外农业科技资料, 1974 (2): 1-14
- 邱式邦. 美国昆虫激素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中国农业科学院: 国外农业科技资料, 1974 (2): 35-43
- 邱式邦. 学习综合防治的一些体会. 全国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讨论会资料选编, 1974, 153-160
- 邱式邦, 田毓起. 草蛉幼虫集体饲养方法的研究. 昆虫知识, 1975 (4): 15-17
- 邱式邦. 怎样饲养草蛉. 农科通讯, 1975 (11): 36-37
- 邱式邦, 于久钧. 介绍几种中华草蛉成虫的新饲料. 农科通讯, 1976 (10): 27
- 邱式邦. 植保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 中国农业科学, 1976 (1): 41-47
- 邱式邦. 综合防治—减少农业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环境保护, 1976 (1): 12-16
- 邱式邦. 草蛉的冬季饲养. 昆虫知识, 1977 (5): 143-144
- 邱式邦. 饲养米蛾、繁殖草蛉. 农科通讯, 1977 (10-11)
- 邱式邦. 生物防治—害虫综合防治的重要内容. 山西芮城植保师资训练班讲稿, 1977
- 邱式邦, 周伟儒, 于久钧. 米蛾集中羽化器. 农科通讯, 1978 (5): 30
- 邱式邦. 墨西哥生物防治工作概况. 昆虫知识, 1978 (2): 57
- 邱式邦. 中国的生物防治. 在墨西哥第 6 次全国生防会议上的讲稿, 1978
- 邱式邦. 赴墨西哥生物防治考察报告. 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出国农业考察材料, 1979, 1-4
- 邱式邦, 周伟儒, 于久钧. 用塑料薄膜作隔离物饲养草蛉. 农科通讯, 1979 (1): 28
- 邱式邦, 周伟儒, 于久钧. 中华草蛉茧和卵的低温贮藏. 农科通讯, 1979 (6): 34-35
- 邱式邦等. 赴美生物防治考察报告. 1979
- 邱式邦. 参加第 9 届联合国粮农组织虫害综合防治专家委员会例会的情况汇报 (1979)
- 邱式邦. 关于国内外小卵繁蜂及利用情况. 山西米蛾机械化饲养鉴定会上讲稿, 1980
- 邱式邦, 田毓起, 周伟儒. 改进米蛾饲养技术的研究. 植保学报, 1980 (3): 153-158
- 邱式邦. 要正确看待和支持生物防治工作. 河北省农业害虫生物防治讲习会资料汇编, 1981
- 周伟儒, 刘志兰, 邱式邦. 用干粉饲料饲养中华草蛉成虫的研究. 植物保护, 1980 (5): 2-3
- 邱式邦. 繁殖和利用中华草蛉防治害虫 (英文). 中美生防学术讨论会文集, 1982

- 邱式邦. 利用本国天敌进行害虫生物防治 (英文). 第 10 届国际植保会议会刊, 1983
- 邱式邦等. 中国生物防治考察组赴法考察报告. 1983
- 邱式邦. 让生物防治在综合防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生物防治的进展, 1984. 1-12, 农业出版社
- 邱式邦. 害虫生物防治工作的展望. 农科通讯, 1985 (未发表)
- 周伟儒, 陈红印, 邱式邦. 用简化配方的人工卵连代饲养中华草蛉. 生物防治通报, 1985 (1): 8-11
- 邱式邦. 中国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概况 (法文). Agonomie, 1986 (9): 857-861
- 王韧, 周伟儒, 邱式邦. 北京地区中华草蛉发生消长及其原因的探讨. 生物防治通报, 1986 (3): 103-107
- 王韧, 周伟儒, 邱式邦. 中华草蛉人工贮存越冬及打破休眠的研究. 生物防治通报, 1987 (2): 55-60
- 周伟儒, 王韧, 邱式邦. 保护草蛉、扩大种群基数. 全国第一次天敌保护利用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1987, 21-25
- 邱式邦, 包建中, 王韧等. 天敌引种结果. 中国农业科学专辑 (英文), 1957-1987, 99-102
- 万方浩, 王韧, 邱式邦. 豚草条纹叶甲的寄主专一性测定. 生物防治通报, 1989 (1): 20-23
- 周伟儒, 王韧, 邱式邦. 用黄豆芽作产卵植物繁殖东亚小花蝽. 生物防治通报, 1991 (1): 7-9
- 周伟儒, 王韧, 邱式邦. 麦田接种释放中华草蛉成活率的研究. 生物防治通报, 1991 (3): 97-100
- 邱式邦. 蝗虫生物防治的新进展. 植保参考, 1992 (6): 13-14
- 邱式邦. 1993 年非洲利用绿僵菌防治蝗虫结果. 生物防治通报, 1994 (4): 186
- 邱式邦. 发展生物防治技术, 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1994, 474-482
- 邱式邦. 生物防治中国大百科全书 (昆虫卷): 1 015-1 018